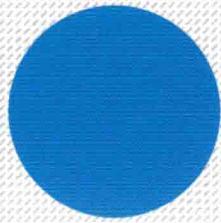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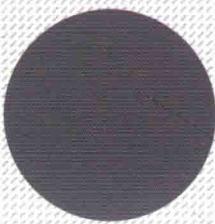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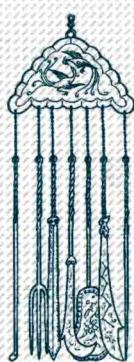


乡村传播网络与 共同体重建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传播社会学分析

谭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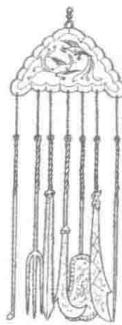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乡村传播网络与

共同体重建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传播社会学分析

谭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传播网络与共同体重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传播社会学分析 /
谭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203-2774-9

I. ①乡… II. ①谭… III. ①少数民族-农村文化-文化发展-传播学-
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430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25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问题乡村与乡村问题	(1)
第一节 语境：乡村的终结还是乡村的纠结	(2)
一 乡村的终结——从阿伦贝皮到“我的村庄我的国”	(2)
二 乡村的纠结——从田园主义的批判到风险社会的行动策略	(7)
第二节 为什么要关心乡村的当代命运	(9)
一 研究问题	(9)
二 选题缘由	(11)
三 研究意义	(18)
第三节 研究视角	(20)
一 传播社会学的理论视野	(21)
二 发展传播学的范式框架	(23)
三 乡村人类学方法论取向	(25)
第四节 阐释逻辑及内容结构	(27)
第一章 从田野个案延伸出去：方法论反思及实践	(31)
第一节 研究思路、策略与方法	(32)
一 研究思路	(32)
二 策略与方法	(32)
第二节 走出个案：社区研究的理论关怀与学术追求	(36)
一 普适性问题——对社区研究方法论的省思	(36)
二 走出个案——社区研究范式的理论诉求	(41)
三 拓展个案法的一般原则及要求	(49)
第三节 在不断的自我折磨中进入我的“田野”	(51)
一 寻找“理论地图”武装我的头脑	(52)
二 “按图索骥”——进入我的“田野”	(56)

三 叙述和阐释：我的身份与位置	(58)
第二章 乡村文化发展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	(62)
第一节 传播与发展：传播学视野里的文化变迁	(62)
一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文化	(63)
二 发展传播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	(71)
三 乡村传播研究与乡村文化建设	(79)
第二节 传播与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文化变迁	(91)
一 进化论学派的文化变迁理论	(91)
二 传播论学派的文化发展理论	(93)
第三节 离乡与守土的辩证：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文化建设	(96)
一 1920—1940 年：乡村建设派的文化改良运动与社区研究的 勃兴	(97)
二 1950—1970 年：西方汉学家的中国乡村研究与方法 论反思	(99)
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研究与新农村建设	(100)
第四节 乡村传播网络与乡村文化发展 ——我的理论取向	(104)
第三章 乡村传播与社区重建研究框架的新尝试	(107)
第一节 建构“工具箱”：四个分析性概念的引入	(108)
一 乡村传播网络	(108)
二 乡村共同体	(114)
三 文化再生产	(120)
四 凝视	(123)
第二节 寻找“螺丝刀”：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社区实践的 链接	(127)
一 时间纽带：乡村传播网络中他者凝视惯习与行动逻辑	(128)
二 空间连接点：作为乡村传播与文化再生产场域的乡村	(130)
第四章 枫村的自然环境与传播生态	(134)
第一节 枫村：我的田野工作点	(135)
一 区域背景：自然与社会经济状况	(135)
二 村庄空间：枫村位置与聚落布局	(136)
三 时间进路：隶属沿革与人文环境	(139)

第二节 枫村的文化传播生态	(145)
一 无物不媒介：传统的“泛媒体”时代	(145)
二 遗忘与无奈：枫村的现代传播图景	(149)
三 凝视的网络与弥漫的权力：“混搭”的泛传播图景	(154)
第五章 他者凝视：乡村传播场域中的行动者逻辑	(166)
第一节 枫村文化传播场域的结构	(168)
一 文化传播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	(168)
二 乡村文化传播场域的关系结构	(169)
三 枫村传播场域的行动者惯习	(175)
第二节 多元建构：人际传播网络的实践逻辑	(178)
一 陌生人的潜在影响	(179)
二 个体化的文化资本转换策略	(182)
三 文化展演的资本交换逻辑	(185)
四 在凝视中重构乡村空间	(190)
五 关系的发展——乡村内部的往来与馈赠	(195)
第三节 权力下渗：组织传播网络的实践逻辑	(201)
一 文化下乡对乡下文化的凝视	(203)
二 乡村组织传播与权力嵌入	(205)
三 乡村精英再造与文化传播	(209)
第四节 意识唤醒：大众传播网络的实践逻辑	(213)
一 乡镇集市是大众传媒辐射乡村的桥梁	(214)
二 媒介的空间想象与被中介化的乡村	(218)
三 农家书屋的孤独与权力凝视的尴尬	(221)
四 电视对乡村生活的消解与建构	(224)
第五节 个体赋权：新媒体与乡村日常生活的现代性	(233)
一 无线 Wi-Fi 与“扯白堂”空间功能的新拓展	(234)
二 小 J “蹭” 网与社会交往空间的拓展	(236)
第六章 植入的自我：乡村文化再生产的主体性逻辑	(244)
第一节 差异性：乡村文化的他者化生产	(246)
一 他者化生产的外源动力机制	(246)
二 他者凝视对差异性的期待	(247)
第二节 兼容性：他者经验的重新地方化	(249)

一 重新地方化的一般路径	(249)
二 外源动力转化为内生动力的基本逻辑	(251)
第三节 乡村共同体重建的定位与导向问题	(253)
第七章 超越村落，超越传播：凝视的力量	(256)
第一节 双向凝视中的传统再造	(256)
一 双向凝视中的权力互动	(256)
二 凝视引起的内卷化问题	(258)
第二节 他者凝视中的权力关系	(260)
一 旅游凝视中的权力关系	(261)
二 政府、市场、专家之间的权力转换逻辑	(262)
三 大众传媒对乡村的凝视	(265)
第三节 地方凝视中的乡村调适	(266)
一 乡村自我凝视机制的产生	(266)
二 乡村自我凝视的内在逻辑	(267)
结语：反身思考与延伸理解	(271)
第一节 田野与知识：在乡土逻辑中重构传播的力量	(271)
第二节 潜在的威胁：审视我的研究方法	(273)
一 拓展个案法的反思意识	(273)
二 拓展个案法的潜在威胁及应对	(276)
第三节 我的身份问题：反思研究伦理	(277)
一 民族志叙事中的伦理审视	(277)
二 对田野工作的伦理检讨	(279)
第四节 研究局限	(282)
一 理论阐释的局限	(282)
二 研究资料的局限	(283)
三 叙述文本的局限	(285)
参考文献	(286)
后记	(310)

导言 问题乡村与乡村问题

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

甘地（Mahatma Gandhi）

山野宁静，乡村安详。瓜棚豆架，鸡犬桑麻。那一缕缕飘起的袅袅炊烟，升腾着乡村的朴素气息。这些都是记忆深处儿时的乡村景象。尽管乡村是生动的，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每一个乡村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简单，有的曲折，每一个乡村故事都把乡村的空间、乡村的景观、乡村的生活、乡村的人情世故呈现在我们眼前，不断向人们述说着乡村的精彩或者无奈。在我的想象空间里，乡村故事是一个乡村的气息，一个乡村的记忆，一个乡村的文化符号，它给予乡村以生命，承载着乡村的灵魂。但每一个人讲述乡村故事的方式又是不同的。我离开故乡已多年，带着对故乡的眷恋，我踏上返乡的旅程，企图去寻找记忆深处的那份乡愁。我漫步在乡间小道，贪婪地吮吸着泥土的芬芳，带着诗意的心情去欣赏恬静安逸的乡村景致——郁郁葱葱的山地丛林、潺潺的小河流水、碧绿的稻田和茶园，还有永远忙碌着的乡亲。时代在发展，乡村在变迁，映入眼帘的这些景观显然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那幅乡村风景画，低矮的乡村老屋和袅袅炊烟已经变成陈旧的故事。今天，昔日沉寂的小山村在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号角声中被唤醒，在各种或悲或喜或猎奇或欣赏的目光注视下迅速成为社会的聚焦点。我们不得不感叹村庄的变迁实在太快，面对村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在惊叹之余，也一直在思考：在急剧的社会变迁面前，乡村内部那个超稳定的文化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在现代化浪潮中，作家笔下所描绘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远去吗？现代化真的是农村社会蕴含的传统文明的“天然敌人”吗？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村里

的村外人”抑或“内部的他者”^①，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述眼前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庄的故事？又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诠释乡村的这些变化呢？

第一节 语境：乡村的终结还是乡村的纠结

一 乡村的终结——从阿伦贝皮到“我的村庄我的国”

在阅读康拉德·科塔克（Conrad Kottak）的《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时，我被他的民族志叙述深深地打动。在科塔克的笔下，一个平凡如斯的巴西小渔村——阿伦贝皮（巴西巴伊亚州），却处处闪现着与众不同，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故事。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电视机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向阿伦贝皮开放”，曾经的“桃花源”在全球化浪潮中“悸动”不安，被卷入不断变迁、蓬勃发展的世界潮流，这片“褐色的”“梦想之地”升起“又一轮新日”，变迁在继续，天堂却已远逝。^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2014年经济数据，2014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③已经初步成为城市型社会。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乡村变迁的过程，本质上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变化。在此如此剧烈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面对乡村未来似乎难以摆脱的“被全球化”“被城市化”的命运，有人在伤感，“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

^① 我来自农村，有着深刻的乡土生活体验，因而自认为是一个熟悉农村生活的“村里人”；可我又离开乡土多年，长期漂泊和行走在城市，对于这些村民而言又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外人”，是一个典型的“家门口的陌生人”。于是，我的田野成为重新建构的过程，既是对故乡的重构，也是对自我的追寻。

^② 科塔克从1962年开始的40多年时间里，对巴西巴伊亚州阿伦贝皮村进行了数次田野调查，见证了这个褐色泻湖边上的小渔村蜕去朴素之美而卷入全球化的全过程，讲述了这个“社会变迁的活化石”的故事，揭示了生存与发展矛盾交织的社会形态。人类学的智慧与理性让他深信：阿伦贝皮人的生存经验和乐观精神能够帮助他们在全球化中随机应变而非格格不入，从而将自己与世界的潮流融为一体。我们在这个关于巴西社区全球化开放的研究个案中，看到了文化传播和社会变迁的创造性过程。

^③ 《国家统计局：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2015年1月20日，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501/20/t20150120_4386891.shtml)。

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或回不去的地方”^①，似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成为扼杀乡村文化的罪魁祸首，似乎“发展”乃万恶之源。难道传统才是天堂，现代化、全球化真的是陷阱吗？毋庸置疑，当今世界，现代化难以逆转，城市化、市场化的渗透又无远弗届，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社区能够完全独善其身、孤芳自赏。在全球传播时代，地区、国家和社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互联性日益加深、拓展和加速，即使是地处遥远的社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社会大的体系的影响，地理意义上的“飞地”（enclave）在文化上的边界已逐渐消失。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大众传媒和电子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现代化已悄然渗透到我们对社区的想象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包含了“全球性”（globality），也包含着“地方性”（locality）和“民族性”（nationality），人类的交往方式和交换关系已经超越了国家边界，全球关联随处可见。于是才有了关于“全球地方/全球地方化”（glocal/glocalization）^②这一组“杂糅性”（hybridity）概念的创造，^③以此强调全球化和地方化二者之间的相反相成与互动发展以及地方对全球文化模式的适应策略。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化已成为全人类的宿命，回归之路早已断绝。

对于现代化发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是否“每个人都是发展的受害者”？^④ 现代化、全球化能否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带来福祉？这些问题谁都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而且每个人的看法也不太一样。科塔克

① 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笔者受此书英文主题My Village, My Country的启发，将作者自序的标题借用到本节开头，目的是想以此来说明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冲击。

② Glocalization一词在中文翻译中并不统一，有诸如“球土化”“全球地域化”“全球地方化”“全球在地化”和“全球本土化”等译法。这种翻译中的差异恰好说明这一英语世界中新造词汇还没有从一般性的术语过渡到严格意义上既具有描述功能，又具有规范功能的学术概念，从深层次反映出 glocalization 这一新的全球化理论话语及其研究视域在我国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明确的认识和评价，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索。

③ [英] 安娜贝拉·穆尼、[美] 贝琪·埃文斯：《全球化关键词》，刘德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136页。

④ 此观点来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约翰·博德利的著作《发展的受害者》。他详细讨论了以文明者自居的“外来者”如何以推动进步的名义对土著居民日常生活的破坏，认为土著人为发展付出了文化生态灭绝的沉痛代价，自始至终都是被动的受害者。参见 [美] 约翰·博德利《发展的受害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特别强调文化转型与变迁的主体是置身文化处境中的个人，“没有个人变迁，就不会有社会变迁，反之亦然”^①。对于某些社会批评家把人群、技术、商业、信息和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变迁看作文化帝国主义的压路机，地方文化则沦为变迁路上的牺牲品的观点，科塔克认为这一看法是消极的，因为它“忽视了人类在与外界交往时会有选择性地作出各种行为。阿伦贝皮人也像其他成千上万当代乡民一样，努力应对外部景象和信息洪流，对这些外部信息加以自己的修正、诠释、加工、抵抗、挑战或排斥”^②。我们在这个关于巴西社区对全球化开放的研究个案中，看到了文化传播和社会变迁的创造性过程，正是这些不断适应变迁的个体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巴西，这个南美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率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然而，曾经摆在巴西人面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今天同样摆在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眼前。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拉开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帷幕。从国家到地方，从权力组织到民间社会，从城市到乡村，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几乎所有地区和个体都卷入其中。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社会“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③，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问题”是最核心的问题，并且具有一种历史延续性。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农民和乡村在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中似乎总是被视作拖后腿的角色。当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喧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许多人认为“被颠覆的村庄”^④走向了“土地的黄昏”^⑤，在一个“单向度的农村”^⑥里，谁来种田的担忧与保卫村庄的话题总是被激烈讨论，乡愁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面对这种变

^① [美] 乔尔·S. 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② [美] 康拉德·科塔克：《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第四版），张经纬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241页。

^③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

^④ 李桂平：《被颠覆的村庄》，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⑤ 张柠：《土地的黄昏——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⑥ 彭大鹏、吴毅：《单向度的农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迁，很多人把视线投向这个特别的场所，都在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感受并记录着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希望能够从这种注视中找寻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近年来在互联网上热传的各种类型的返乡日记或乡村调查就是很好的证明。无论是城里人返乡后的那种即景感怀式的乡愁，还是学者在既定研究框架下冷静思考中的理性乡愁，其实背后都自觉不自觉地隐藏着那种面对全球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时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乡愁，揭示出我们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于是乎有关“问题乡村”的研究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等领域成为中心话题，农民及其生活的乡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再加上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为法国做出了“农民的终结”这一断言，“乡村的终结”就一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重要话题被广泛讨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文化转型的方式与过程各有不同，但由政府主导的指导性变迁居多。有的从穷山恶水之地整体迁移，有的因为人口流失严重导致村落“空心化”^① 而被迫实行村组合并，村庄原来的地理和行政边界逐渐模糊；而一些城市近郊的村民则在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土地财政中失去土地，一夜之间被整体转换成了“城镇居民”……凡此种种，是否就意味着乡村终结了呢？到底终结的是什么呢？村庄未来的走向究竟如何？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去寻找答案。实际上，孟德拉斯所说的文明是由众多小农组成 的传统农业文明，“农民的终结”主要是“小农的终结”，并不是“乡村生活的终结”^②，自然更谈不上是乡村的终结，城镇化并不意味着乡村的消失。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乡村社会出现复兴现象，“乡村重新变成一个生活的场所，就像它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场所”，“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③ 这就更加说明所谓“乡村终结”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就我国农村的现实来看，“虽然当前国家和市场对农民的影响日趋增大，但这并不

① 陈浩天：《乡村“空心化”治理：样态扫描与政府服务》，《理论月刊》2013年第7期。

② 徐杰舜：《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启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③ [法] H.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4、306—307 页。

意味着村落的终结，而是实现转型，从传统封闭自律的生产生活共同体走向现代开放自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作为共同体意义的村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应该是重构，而不是终结”。^①因为乡村的终结与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同一个过程，乡村是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共同体，或者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而存在的，其终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迁过程，不仅“意味着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②，而且充满激烈的矛盾冲突，必然是一段相当漫长而又充满惶惑的旅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本书借由乡村语境切入社会传播与乡村文化发展的研究主题，所以无须赘述什么是“村落的终结”，但对“乡村的终结”这一观点的基本内涵还是有必要强调的，因为这关系到本书所讨论的“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乡村社区重建”问题。从广义上来说，乡村的终结指的是“村落不仅从地理意义上消失了，而且村民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等也从根本上终结了”^③。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还是中国乡村的现实际遇，都能够证明乡村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只是在现代化、城市化洗礼下，原来的乡土本色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后乡土社会”^④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是“乡村”的重新开始，故乡并不一定就已在城市化面前全部“沦陷”，也“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因此，如何面对和适应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浪潮，寻找一种解决全球与本土冲突的实践策略，坚持走内生性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实现乡村复兴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① 李飞、杜云素：《中国村落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下命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②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页。

^③ 龚春明、朱启臻：《村落的终结还是纠结——文献述评与现实审视》，《内蒙古社会学》2012年第6期。

^④ 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陆益龙等学者认为，所谓后乡土性特征是指在乡村社会存在的基本形态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观念和行为都已经受到了现代化的渗透，具有了一些现代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后乡土性所呈现的结构基础是乡土的，但精神气质则是乡土与现代的一种混合。这种变化与存续相互结合，就构成了中国社会基层的一种后乡土性。

二 乡村的纠结——从田园主义的批判到风险社会的行动策略

从前面的分析看，有人担忧的所谓“乡村终结”的问题，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与其说是村落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倒不如说是村落的纠结。”^①说“终结”，主要是基于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把乡村视作都市现代性的避风港和梦想实践的园地，在城乡连接的伦理上还是停留在传统村庄的影子里，带着怀旧之情回想着乡村昔日的盛世年华。认为乡村作为一种自然的、道德的生活方式，遭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破坏而一去不复返，于是开展了形形色色的文化寻根活动，或者以所谓客观中立的旁观者立场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性反思，倡导“新乡土主义”^②。从这些田园主义怀旧传统的各类表述文本能够发现，它们所描摹和憧憬的那种充满诗意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背后，交织的仍然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权力话语”^③，甚至是一种“刻意编造出来的意识形态神话，是对真实历史做出的误导性的回应”^④，关键是这些反思话语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乡村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的自身转化能力”^⑤，所以才会发出这种心酸与无奈的感叹。从中可以看到每一个出身乡村，却又漂泊和行走在城市的人，都情系着那片乡土，我们世世代代的故乡之感、家园之情，不仅被捆绑在乡土中国的空间之上，而且被投射到与传统有关的文化共同体之中。

说“纠结”，笔者认为更多的是着眼于乡村现代化的现实境况和我们对乡村问题的研究。无论是“背井离乡”的外出务工，还是“离土不离乡”的返乡创业，虽然不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那种一辈子都捆绑在土地

^① 龚春明、朱启臻：《村落的终结、纠结与未来：经验反思及价值追寻》，《学术界》2012年第6期。

^②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兴起了“寻根文化”思潮，韩少功、李杭育等是典型。近年来，钱理群、吕新雨、石勇等在《天涯》表达“反城市化”情绪，号召重建乡土文化，探索以乡村社会为本的另类现代化道路。

^③ 曾一果：《想象城市：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④ 韩子满等：《乡村与城市（译序）》，[英]雷蒙德·威廉斯《乡村与城市》，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页。

^⑤ 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上的农民，但他们本质上仍然保持着乡土性。即使地理和物质意义上的乡村不复存在，但生活其中的村民们的社会文化心理边界并未消失，“乡”为他们提供了文化性保护。他们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还是建立在这个“封闭的乡”与“凝固的土”之上。同时却又面临着乡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因空间转换而带来的农民市民化的角色转变、身份认同、“社会排斥”^①等困境。这些现象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说都是一个相当纠结的复杂问题。所以，“守土与离土，中国农民虽然经历了历史的多次选择，但至今仍处在两难的博弈之中”^②。考察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可以发现，“乡村和城市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此外，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中，它们代表的仅仅是两种居住方式”^③。因此，终结的也许只是乡村聚落的外在形式，乡村的文化精神内核却难以消失。那么，这种“守土艰难，离土不易”所带来的乡村“向何处去？如何去？”的问题正是当下让人焦虑和纠结之所在。

无论是“终结”，还是“纠结”，恰好说明了乡村是多种话语的社会空间共同叠加而成的现实。况且当下所有的传统都无法摆脱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而且传统本身就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结果的对照下，才凸显其价值，才使我们认识到另一种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宝贵，“传统”自然也就成为一种标识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醒，促使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重新发掘乡村文明的价值。^④ 所以，重建“失落的传统”本身就应该是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发展的应有之义，乡村发展的道路不会终结，更不用纠结，只是应考虑面对“全球风险社会”（Global Risk Society）时，应如何选择合理的行动策略，去创造乡村的

① 城乡二元结构在当下被逐渐打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有的在城市有稳定的职业，买房买车，但不得不承认，社会制度还是给他们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方面造成了诸多排斥，不能让他们享受城市社会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② 徐杰舜：《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启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③ [英]雷蒙德·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93页。

④ 曾一果：《全球想象与传统的再生产——全球化语境中的大众传媒的“城市叙事”》，《文艺研究》2011年第4期。

“替代性未来”(alternative futures)?^① 其实贝克(Ulrich Beck)所强调的“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中过属于自己的生活”^②，就是主张发展路径并不必然遵循西方模式，应以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对现代化、全球化做出反应，用“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③的策略和态度，去获取乡村自主性发展的空间。换个角度，也许可以说，“旧的天堂已然消逝，新的梦想还在不断涌现”^④，我们看到乡村在“沦陷”，同时我们也看到乡村在生长。乡村自有乡村的生长逻辑，乡村文化发展自然也有更多的可能，乡村文化研究应该就有更多的切入点。

第二节 为什么要关心乡村的当代命运

一 研究问题

中国是一个“村庄大国”^⑤，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来说，乡村无疑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三农”学者于建嵘站在“底层立场”，强调“社区发展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乡村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转型和整合过程，“乡村社区建设是一项事关社会整体结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工程”。^⑥ 因而，关注和研究中国乡村的生存、转型与发展，不仅是社会学的当然责任和重要路径，也是传播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的现实关怀。

① K. H. Halfacree, *A New Space or Spatial Effacement?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the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1999, pp. 67—76.

② [英] 威尔·赫顿等：《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达巍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6页。

③ [英]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④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候选人任珏在2012年5月31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书评《〈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旧的天堂，新的梦想》，她认为科塔克所强调的正是旧的天堂在消失，新的梦想还在不断涌现，这是发展中的悖论。参见任珏《〈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旧的天堂，新的梦想》(<http://www.bookdao.com/article/39567/>)。

⑤ 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⑥ 于建嵘：《底层立场》，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7—80页。

从前面有关乡村是“终结”还是“纠结”的语境出发，我们有必要以一种“底层心态”扎根田野，关注当下民族地区的乡村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变迁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乡村是否在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中被解构？我们站在何种角度和立场来阐释当下的乡村文化变迁？这些便构成了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非常有必要进行多学科视角的学理探究。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本书选择城市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再生产作为研究主题，以乡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传播网络为切入口，遵循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范式，考察社会传播网络与乡村社会结构相互建构的实践逻辑。具体而言，就是透过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传播行为和现象，揭示乡村文化变迁的外部影响因素——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日益频繁的城乡互动与文化传播，如何通过村落共同体的自我转化策略，发展成为文化再生产的内生能动性机制，从而实现“传统的再造”，建构新的社会关系。集中描述和分析外部力量与村庄的内在结构怎样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乡村文化发展。本质上也是“在现代性（modernity）和与之相联系的新权力格局的情境中描述文化的历程”^①，通过村民日常生活的活动图式、内在结构、实践范围、社会行动逻辑以及日常生活的冲突与裂变、消解与建构，去探求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变迁与重塑的规律性。只不过，少数民族乡村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既是中国浩如烟海的无数村落的一员，又带有“少数民族”的身份标签，文化多样性表现更为突出，还涉及文化冲突、传统代续等相对抽象的深层问题，因而不同于一般的汉人村落，有必要另加关注。但是，分析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问题，既要从乡村文化发展的视角，更要将其置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宏观研究语境，将其视作一个文化问题与经济社会问题的叠加和集合，偏废任何一方都不能作出客观理性的判断。而且脱离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具体语境孤立地研究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所构建的很可能只是空中楼阁。

^①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自序。